



世纪文库

#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

罗根泽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

錢玄同顯字

罗根泽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 黄霖序

罗根泽先生是我敬仰的同行前辈。早在1961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大学三年级准备考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专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朱先生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告诉我说，“罗先生不堪病魔的折磨，不幸离开我们了。”一时令人唏嘘不已。不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罗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第三册新写的两宋部分，还是我系老师郭绍虞先生写的序。朱先生与郭先生、罗先生各自所写的三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公认的该学科的奠基性著作。朱先生后来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我也聆听过郭先生的教诲，只是远在南京的罗先生未曾去拜谒请教过，但实际上，他也是我心中的一个老师。我就是读着他们的著作，跟着他们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道路。

郭、朱、罗三人(以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间为序)之所以能鼎立而三，是由于他们的著作各有特点，各有所长。

郭先生的著作，“史”的观念最显明，建构了一个“演进→复古→完成”的框架，要“使人窥出一些文学的流变”(《自序》)。全书规模宏大，材料丰赡，特别在论及范畴、流派等处，辨源析流，论说细致。

朱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人立目，体例一致，文字精要，思路明晰，尤以“远略近详”的谋略与关注小说、戏曲批评而独具只眼，自见特识。

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未能成为全史，但也有其卓然自立者在。其最引人注目处，即是在发掘材料上独立特行，下足工夫。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草创之初，披荆斩棘，在一片荒地上发掘材料，无疑是当务之急，也是百年大计。罗先生做学

问能吃苦，他一生就是在贫寒、战乱与疾病中熬出来的。他出身寒微，全靠励志苦学，好不容易能同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从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黄子通等名家学习，后来研究子学，都是十分重视资料的开掘与考索。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材料又分散在笔记、序跋、诗词、评注等零简散章中，必须要有一种大海捞针的精神，才能将它们一一检出。他编批评史，就立志“蒐览务全”，并以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言“著书譬犹铸币，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以自励，所以他确实是继郭绍虞先生之后又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并不甘心于吃别人嚼过的馍。假如将罗著与郭著相较，可以看到他写的许多有关人物、著述与论题为郭著所无。当然，在这里有些部分如“音律说”、“诗句图”等在郭先生眼中恐怕还算不上是理论批评，所以是故意忽略的；但另有一些确实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如谈唐诗时谈到的杨綰、刘峣、尚衡等，谈唐代古文时讲到的沈亚之等，谈晚唐时提到的黄滔、吴融、刘昫等，谈宋代诗文时又列出的智圆、史铭、刘夬、陈耆卿等，都是让读者看到了一些生面孔。这就难怪郭先生很有感慨地说：“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散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即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而雨亭（罗先生字）用力能这样勤，在筚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

正因为罗先生发掘了不少新的材料，就能在这基础上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比如第一册第十一章“佛经翻译论”，从支谦到赞宁，罗著共列出了十节，娓娓道来，为郭、朱两家都未顾及。假如从正宗的文学批评论来看，或许讲翻译论有点走了偏锋，但从广义来看，不妨也可给它一个存在的角落。至于像罗著第二册讲隋唐文学批评史时，用两章的篇幅大谈特谈“诗的对偶及作法”还意犹未尽，后面再加相关的两章专论“诗格”。这些内容似乎不能说都是属于修辞，与文学批评无关，而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形式论的重要内容。罗先生在这方面

的开掘与梳理是有贡献的。再如第三册第十一章，专门论述了诗话、词话、文话及诗文评点等一些富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的批评样式，阐明了它们的特点、流变等基本情况，很有意义。特别是关于“诗文评点”的问题，自胡适、鲁迅等对此发表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之后，学界主流一般都对评点持鄙夷不屑的态度。在这样一种潮流中，罗先生曾经也认为评点是“毫无价值”的“陋习”（商务版《绪言》），而经朱自清先生批评后（见其《诗文评的发展》），即能从善如流，在后来的再版中即将“场屋陋习”挖改成了“科举场屋”，将“毫无价值”挖改成了“无甚价值”，并对评点专列一节进行了创造性的述论，使我非常敬服。后来我将刘辰翁首次引入小说批评的研究领域，就是从罗先生的批评史中得到了直接的启发和信息，并使我对中国古代文学评点的研究兴趣至今而不衰。

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例方面，罗先生的创新意识很强。作为编史者，体例是必须考虑的。郭先生说他的书“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自序》），实际上是根据需要，随机而编。朱著屏去了一切分类，“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他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自序》）。分类立目，将会平添许多困难与混乱，所以其目录基本上都是人名。罗先生则想别创一种“综合体”，以“兼揽众长”：“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时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这一设想不可谓不周备，其优长特别表现在以纪事本末体分类后，以纪传体依人细述，能将某一时代中的某一论题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作一比较完整的交代，容易将其来龙去脉，梳理得一清二楚。如在隋唐文学批评史部分的“早期古文论”一章，下分九节，从“古文的兴起”一节略述了刘勰等先进之后，接着述



评了“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唐初四杰的反对淫巧文”“陈子昂与卢藏用的提出载道说”“萧颖士李华的宗经尚简说”“独孤及元结的折中意见”“梁肃的提出文气与李观的重视文辞”“古文理论家柳冕的文论”“权德舆的二尚二有说”“吕温独孤郁等的天文说与人文说”，既论点完整，又眉目清晰。然这样编排的问题也随即而来，有时一人之说，分在两章，如曹丕在“创作论”中谈及后，又在下面的“鉴赏论”中提到；而有的在多方面有见解的论者，却只在一处论述，如韩愈被置于“古文论”题下之后，在唐代的诗论中则付阙如；与上相反，有的却一人在一章下分列了几节，其中有的节的内容明显溢出了题外，如宋代部分“苏轼及其他议论派的述意达辞说”一章，有三节述论苏轼，第一节述其“述意达辞说”，紧扣章目，而下又增两节——“诗论及词论”与“鉴赏、批评、文学价值”，显然都是题外之话；再有不少章节，在以纪事本末体之章目下，根本无法用纪传体来以人列目，如“隋唐文学批评史”篇中的第五章“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下列九节，除第九节“刘知幾的意见”之外，其余八节，均非纪传之体，而是这样一些的名目：“唐初史学之盛”“文学为政治工具论”“艳丽之毒”“折中的文学论”“天才与学力”“文学史观”“史与文”“史传文的批评”。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罗先生尽管讲过一句“遇有特殊的情形，则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但读者读后，不免觉得有点“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了。

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另一个特色是积极引进西方的观念与方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引进西方的话语是一股潮流。正如朱自清先生说的：“‘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毫无疑问，郭、朱、罗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学批评史观的浸润。在郭、朱、罗三人之中，论英语，首推东润师。他在英国留过学，翻译过不少小说，写过研究英国文学的论文，在写中国文

学批评史之前，原是在武汉大学教英语的，当他奉院长闻一多先生之命教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却较少直接用西方的文学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文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谈及唐代诗论时曾说，“大都可分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云云，也只是偶尔为之。总体上还是以“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来写批评史的。郭先生的批评史，也用“杂文学”“纯文学”等观念来论史，但在分章立节时，他所用的话语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如“孔门之文学观”“关于‘文学’诸名之意义”“尚文与尚用”“知言说”“养气说”“由史籍中窥见汉人对于文学之认识”“‘文学’与‘文章’‘文辞’之区别”“艺文志中之诗赋略”“经学家之论诗见解”等等。与此不同的是，罗著的西化色彩比较浓。开卷第一章的长篇“绪言”，从“文学界说”“文学批评界说”说起，洋洋洒洒说了14个论题，较多地借鉴了西人的路数来加以立论。这实际上也是他开始著书的指导思想。这正如朱自清先生所指出的，罗著是借了西方来的“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来看我们诗文评的本来面目的（《诗文评的发展》）。且看第一册各章节的标题，虽然也有如“王充的文学批评”“文笔之辨”等，但有相当的部分是用“文学的概念”“文体类”“音律说”“创作论”“鉴赏论”“文学论”之类的标目，明显是西方化了的。后来傅庚生先生写《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彻底，完全是在“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之类的框架下，排比了中国文论的材料。不过，罗先生写到后来，似乎渐渐抛弃了这样的思路，在第三册中，几乎全是用传统本色的词语作标题了。

中国的文学批评史究竟如何写？是用西方的一套话语来消解中国传统的文论，还是立足在中国的传统之上去消化西方的文论？实际上到今天还值得探讨。面对着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如何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文论的优秀传统，走正中西融合、古今通变的道路，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在这里，郭、朱、罗三位先生都为我们奠定了基

础，树立了榜样：他们是站立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点上，努力去吸取与消化西方文论的观念，编写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史。如罗先生，在书中用“载道”与“缘情”、“尚用”与“尚文”等二元对立的观点来解释文学批评的发展，虽然从中可以看到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将文学分为“知识”与“情感”两类的影子，但毕竟两者从内涵到形式都并不相同。罗先生用的已经是中国化了的本土话语。当然也不容讳言，他们在草创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新兴学科的摸索过程中，难免也存在着一些缺失，走过了一些弯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不足作为教训来反思，但绝无理由来轻薄先行的长者。面对着郭、朱、罗这样成绩卓著、令人敬畏的前辈，不能不令人想起杜甫的两句话来作为我这篇小序的结语：一句是“王杨卢骆当时体”，应该历史地看待他们的成败得失；另一句就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他们的光辉名字将会永载史册。

2015年6月20日

## 郭绍虞序

“不禁感慨系之”，真想不到由我来序罗雨亭(根泽)同志的遗著。雨亭年龄比我小，精力比我强，只由于疾病缠身，竟使他余业未就，夙志以歿，所以写此序时，百感交集，真不免墨沈泪痕，一齐涌上了笔端。当我在无锡疗养的时候，得雨亭信，已说肝病很重，语气间颇有伤感情绪，我除复信慰问外，再带一些勉励意思，要求我们两人都能把病养好，重做工作。但是，到现在，雨亭竟斗不过病魔而逝世了，而由我来序他的遗著了，序他仅仅部分完成还没有全部完成的遗著了。既为私谊恻，更觉得这是学术上的损失。

雨亭少年好学，除入清华国学研究所外，再入燕京的国学研究所。当时他治诸子之学，已有所成就。不久我因事不能再兼清华的文学批评史课，就邀他接我的课。雨亭当时有难色，谦让不肯去。我说治一门学问有成就的，治别一门也决无问题。这话固然说得偏一些，但对雨亭来讲，而且指这两门学问讲，我想还是很合适的。于是，雨亭开始教文学批评史的课。果然，雨亭不但能胜任，而且比了他的诸子之学有更大的成就。

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这样勤，在筚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

的。至于观点方法，如果说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则是旧知识分子一般的局限，我们不必在这方面加以苛求。而且，以我所知，他在这本书中，也确是想尽力做到减少错误或没有错误的。

遗著，他的文学批评史的遗著，只能到这一时期为止，不能再看到他搜集的明清部分的材料了，更不能再看到他对明清部分材料的意见了。看到琴尚且想到抚琴的人，何况是序他的遗著呢？何况是序他没有全部完成的遗著呢？何况是序我认为畏友的遗著呢！

真不禁感慨系之！

郭绍虞

1961年11月11日

## 再版重印序

去年新版付排的时候，本来就打算仿效郭沫若先生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附上一篇自我批判式的序言。惜值卧病医院，力不从心，结果只写了一篇不到一千字的新版序，声明：对旧版虽略有修改，但“仍保存了原来的组织和面貌”，一般受解放前、抗战前自己旧观点局限的地方，没有改动。又声明：“对时代意识的关系，我非常地强调并注意分析，但对更有关系的阶级意识却注意不够，虽然有的地方也注意到了。”

在解放前、抗战前，我是在用什么旧观点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呢？在旧序里，我说：

故今兹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

在绪言里，我又说：

编著历史者，必需祛除成见。……祛除成见才能客观。

很显然，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错误是严重的，所以解放后一开展学习，我就首先提出对这种观点的自我批判。后来又在《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和治学方法》一文里说：“在解放前，我长期的陷在客观主义的泥淖里。通过这次对胡适及俞平伯先生的研究红楼梦的批判学习，当更深刻检查，随时警惕。”

其实呢，早在1894年，列宁就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和司徒卢威

先生的著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这一经典著作里，对小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有严正的分析 and 批判。他说：

客观主义者谈论某一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精确地确定某一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性关系。客观主义者在证明某些事实的必然性时，常常纠缠到替这些事实辩护的观点上去；唯物主义者则揭露阶级矛盾，并借以决定自己的观点。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唯物主义者则谈论那“管理”特定经济制度，并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由此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完满地实现自己的客观主义。他不仅仅限于指出过程的必然性，而且还要说明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以内容，到底哪一个阶级决定这一必然性。……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是具有所谓党性的，因而它在对事件作任何评价时必须率直而且公开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观点上。

是的，我只是喜欢追寻某一文学理论批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的现象，却没有想到“还要说明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以内容，到底哪一个阶级决定这一必然性”。更没有能“揭露阶级矛盾，并决定自己的观点”。相反的，恰巧是“常常纠缠到替这些事实辩护的观点上去”，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更严重的，有的地方，特别在周秦两汉部分，因为写的时间最早，甚或流于主观唯心论。如对孔子的所以以功用的观点说诗，认为是由于他是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对孟子的不能正确的“以意逆”诗人之“志”，认为是由于他的“讲道德，说仁义”。实则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的由于他俩都出身封建阶级，都站在维护封建阶级利益，整顿封建阶级阵容的观点来理解诗、要求诗，所以才一则希望“诗无邪”，一则硬以封建儒家所提倡的“仁”“孝”的观点来“逆”诗人之“志”。

追寻文学理论批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现象的例子，如对李商隐在韩柳提倡载道的文学以后，他特别提倡缘情的文学，认为必然有反对载道的言论。反复寻找，找到了，他在《上崔华州书》说：“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能攫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其高下哉？”又如对宋初文人在经过晚唐五代，韩柳李杜的作品遭受散失、声名亦被压抑以后，大家都来搜辑学习，认为必然有鲜明的口号，东找西找，找到了，王禹偁在《赠朱严一诗》说：“谁怜所为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可是找到了就认为“万事大吉”，没有再想到更精确地确定这是由于什么阶级阶层的意识与力量来决定这一必然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所产生的对抗性的关系，更没有想到研究这一必然性在历史上起了促进或促退的作用，虽然对李商隐的反道缘情，也笼统地说“除了社会的大原因以外，与他的身份有关”。

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而“纠缠到替事实辩护的观点上去”的地方，那就更多了。如对元稹、白居易的放弃鼓吹并写作“讽喻诗”而转于鼓吹并写作“闲适诗”和“艳诗”，从标题的“触忌与退转”，就知道是在替他俩辩护。不错，触忌被迫的因素是应当指出的。但这指出的矛头应指向统治阶级对进步作家、进步理论家的迫害。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再抛出一把矛头，指向元白本人的由于出身封建阶级而带来的先天的软弱性与两面性，缺少坚持斗争的勇气。我在臚列了迫害的事实以后说：“无情的贬谪，使他俩认识了执政者的厉害，认识了时政的不容人补察。由于个人的势小力微，不敢再倡导社会诗了。为了保全性命，只有退转的一个办法，由是元稹转于艳情，白居易转于闲适。”对统治阶级没有明确地批判，对元白更只是一味地曲子辩护。

还有不是对一个人的退转蜕变的理论，而是对一些人的腐化堕落的理论，也往往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纠缠到替这些事实辩护的观点上去”。如叙述晚唐五代的文学论时，先自唐代社会的变迁说起，认为有三次变迁崩溃，到第三次——即黄巢起义时的总崩溃以



后，文章家和诗人，都怨于过去“救世刺世的都不见容于世”，“大半都放弃救世与刺世，而返回来救自己；由是自救世刺世的文学，变为自娱娱人的文学”。这样，就把他们的鼓吹堕落的缘情、隐逸、香艳、清丽的理论，都推到“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都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而反艳丽，呼吁文章丧亡的进步的理论，也就只能和他们相提并论，没有得到应得的崇高地位，同时现实主义对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也就不能显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也是由于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学者，像英国的森次巴力的把文学批评的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在绪言里，一方面虽指出“不够”，一方面又吸收来列入“批评的方法”。其实，作为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同样也是在绪言里，还引列了小泉八云和法朗士的说法，毫无批判地作为论据，也都有问题。

另外，五四以后，流行过一种说法，不是从表现形式和方法的不同来区别文学作品和哲学论文，而是说文学作品是在表达情感，哲学论文是在表达思想。有的地方，特别是周秦两汉部分，我也沿袭了这种错误。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这句名言，我在绪言里征引过了，并且说：“五四的学者，因为时移事改，知道了古人之以传统的载道的观念曲解历史，却不知自己也正作曲解历史的工作；不过不依传统的载道观念，而改依五四的缘情观念而已。”又说：“果然，时移事改，五四的曲解历史，又被我们知道了。”应该承认，我那时知道的还很模糊。事实上，研究历史——不论一般的通史或学艺专史，如不依据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有确切的分析与论述。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贍，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由于抗战期间的没有能续写，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没有写完出齐，简明的中国